

《中国人口研究丛书》

中国农村社区 生育文化



主编 彭希哲 戴星翼

《中国人口研究丛书》

C924.24
20
2

中国农村社区生育文化

089196

主 编 袁希哲
戴星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人口研究丛书 ·
中国农村社区生育文化
彭希哲 戴星翼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昆山亭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4 字数: 290千字

1996年10月第一版

199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1,000本

ISBN 7-5617-1363-0/C·032

定 价: 20.00元

《中国人口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

彭珮云 胡焕庸 邬沧萍 查瑞传

主编

桂世勋

副主编

张善余 曾 毅 阚延河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嗣均 左学金 朱云成 朱宝树

冯立天 张志良 张善余 胡启迪

桂世勋 顾宝昌 曾 毅 彭希哲

阚延河 缪宏才

序

彭佩云

人口问题是当今举世瞩目的重大问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很好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对下世纪中叶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将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促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在本世纪末，我国将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伟大的实践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现在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人口科学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和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这是时代赋予我国人口科学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人口科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科学。人口科学研究不但与人的出生有关,而且与人本身的健康成长、入学就业、婚姻家庭、居住环境、医疗保健、流动迁移、养老保障、死亡以及与受人制约的社会服务设施规划、商品经济市场预测等密切相关。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许多人口科学工作者发挥了各自的学科专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人口发展中的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一套《中国人口研究》丛书,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反映人口科学应用研究成果的丛书。它的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密切结合我国国情,从各个侧面反映近年来研究中国人口问题所取得的较高水平的新成果。计划收入这套丛书的应用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人口经济、人口社会、人口生态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关中国农村社区生育文化与人口控制的研究、中国独生子女的研究、中国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照顾问题的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研究、中国人口垂直分布和山区人口再分布的研究、中国开发区外来人口问题的研究、中国开发扶贫与环境移民的研究等,都是当前中国人口发展中的一些重点和热点问题。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繁荣中国人口科学,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树立大人口观念,扩大

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将是有益的。

中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中国理应在人口科学的发展上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我希望中国的人口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入领会邓小平同志的人口思想,继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与实际工作者紧密结合,互相学习,创造性地开展研究,争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进一步繁荣我国的人口科学作出贡献。

目 录

序	彭珮云
---------	-----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生育决定中的风险最小化原则	14
第三章	左右群众生育决策的泛风险感	28
第四章	老年生活保障与农村人口控制	56
第五章	经济因素在人口控制中的作用	73
第六章	社区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	110
第七章	生育行为的社区分析	139
第八章	社区发展与人口控制	184
第九章	生育文化与人口控制	208
第十章	多孩生育研究	240
第十一章	二孩与多孩生育间的比较分析	268
第十二章	不同计划生育现状社区的比较分析	293
第十三章	社区发展与计划生育一体化	327
后记		340

Contents

Preface	Pen Peiyun
Chapter 1 Introduction	1
Chapter 2 The principle of risk minimization in fertility decision	14
Chapter 3 General sense of risks influencing the masses fertility decision	28
Chapter 4 old-age security and population control in rural areas.....	56
Chapter 5 The effect of economic factors in population control.....	73
Chapter 6 Community theory and Chinese rural communities	110
Chapter 7 The analysis of fertility behavior at community level.....	139
Chapter 8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control	184
Chapter 9 Culture perspective of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control.....	208
Chapter 10	study on high-older births	240
Chapter 11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high and low fertility	268
Chapter 12	Comparison among communities with different featares of family planning	293
Chapter 13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family planning	327

第一章

引言

一、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控制问题

我国自 70 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人口控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妇女总和生育率和多胎率都已大幅度下降,前者由 60 年代的 5.68、70 年代的 4.01 降到 1980 年的 2.24、1987 年的 2.19,多胎率也由 70 年代初的 62%、1980 年的 31.6%,降到 1988 年的 14.4%。然而,展望 90 年代,人口形势依然严峻。始于 80 年代中期的第三次生育高峰,将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后期。1991—1995 年期间,每年新进入生育峰值年龄(目前是 23 岁)的妇女人数平均在 1200 万以上,形成人口史上数量最庞大的生育大军。据统计,自 1986 年起,每年出生人数约为 2300 万,其中有约 400 万是属于多胎生育,占当年生育人口的 17% 左右。同时,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发展极不平衡。1988 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分析表明,目前全国已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妇女约占育龄妇女总数的 81%,这个比例在非农业人口中为 33%,在农业人口中高达 93%,而且全国大约有 1/3 的育龄妇女已生了三个以上的孩子,在农村该比例为 46%。可见多孩生育的问题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仍

是相当严重的。

农村 80 年代的生育形势表明,在 80 年代初,由于生育政策由晚、稀、少改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及新婚姻法的公布,使 70 年代留下的晚婚晚育人群和 80 年代初的早婚早育人群一起涌向一孩行列;而 80 年代中期,由于完善生育政策的过程和农村改革的新形势,又使 80 年代初的一孩妇女群正好涌入二孩行列;这样到 80 年代末,我们面临的便是大量已生育了二孩的农村育龄妇女,随时可能向多孩进军。新进入生育峰值年龄的人口浪潮再加上可能向多孩发展的育龄妇女之累积,使 90 年代人口控制确实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

充分认识到我国人口态势的严峻性,我国政府在 90 年代初对计划生育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自 1991 年始,党中央、国务院已连续多年召开高规格的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从中央直至地方各级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计划生育。在强调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同时加大对计划生育的投入,调动各类资源支持计划生育工作,逐渐完善计划生育(以下简称“计生”)系统的管理和服 务,并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这一点,在制止多孩生育上尤为突出。

然而,对于拥有七亿以上人口的腹地和边远农村来说,与人口控制有关的一些基本矛盾并未因领导亲自抓而得到充分缓解,有些问题甚至进一步变得突出起来。群众的生育意愿与政府的要求之间依然存在一定差距,计划生育矛盾大、代价高、易反复的特点并未淡化。其中,易反复的含义是目前政府对计生工作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不能有任何松动,如果主要领导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领域,生育率强烈反弹的可能性便会增大。

我国计划生育的代价高低是一个有争议的论题。若直接以各级政府对计生部门的投入来衡量,我国计划生育的成本是不高的,

甚至一直为投入过少而困扰。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部门对计生领域的配合支持，动用的各方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考虑到计生工作引发的另一些社会问题甚至是副作用，以及系统外投入的机会成本，谓之代价高也不是言过其实。至少对于计划生育的目前投入来说是如此。

为了缓解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这些基本矛盾，首先需要能对这些问题作出良好解释的理论。这样的理论由于能较真实地反映上述矛盾的起因、互动和发展，因而由其所派生的对策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寻求这样的理论突破是我国人口学界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因此，在系统展开本课题的各项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近年来在分析研究我国农村群众生育意愿，特别是多孩生育方面有影响的西方理论，以及我国学者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作出的发展，并探讨它们的政策含义。

二、人口生育理论回顾

1. 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最简单的表述就是，存在着一个从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向现代社会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过渡的人口转变过程。由于这一过程以死亡率下降开始，生育率下降相对滞后，因此转变过程会伴随着加速的人口增长。推动人口转变的原因是大量的，但在宏观水平上，其原动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人口转变理论在现代人口学领域中有着重要地位，它对我国学者的影响非常强大。不少学者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腹地 and 边远农村的人口形势和计生工作中的矛盾。其研究也往往在较宏观的水平上。

从传统的人口转变论出发,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腹地农村计划生育难度较大是必然的,并且这种难度会随经济的发展而下降。用历史的眼光看,这种解释无疑是对的。人口转变论者认为我国80年代出生率的回升是中国的人口转变在没有现代化推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人口政策作用的反映。行政干预和人口政策的有效性有一定的限度,当出生率降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会遇到缺乏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的多生育基础的阻滞。既然如此,其对策主要不外乎两个方面。

首先,承认中国计划生育的成功主要依靠行政干预力量。在社会经济未有长足发展的情况下,要实现人口控制目标,在短期内只能沿原有的管理体系和运作机制的轨迹发展。进一步抓紧计划生育工作就意味着行政干预力度的增强。

其次,大力发展经济,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具体措施包括加速城市化,推进乡村经济发展等。

人口转变理论的许多观点无疑是合理的。但它在承认现实的同时,并未为我们提供可操作的、能切实缓解目前我国计划生育中的诸多矛盾的对策方案。同时,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也无法解释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地区为何在人口态势上存在巨大的差异。所谓的“拐点”论,即当经济收入水平上升到某一点以后群众生育意愿和行为会自然改变的看法,在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过程中也未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2. 生育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生育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实质是关于生育的微观经济理论。它将传统微观经济理论学中消费选择理论与家庭(人口)生产的理论结合起来,把生育看作是一对夫妇对子女数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是根据自己对孩子和其他物品的偏好作出的,并受到价格和收

入因素的制约,目的是为达到终生效用的最大值,孩子在这里被视为耐用消费品。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到目前为止,生育的微观经济理论已出现了多种形式,这里仅主要言及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三种。

其中,最具影响的要算是贝克尔(Gary Becker)于1960年提出的“新家庭经济理论”。在该理论中,他提出三个相当有说服力的假设:(1)极大化行为,(2)存在有各级效能的市场以协调各种不同参与者的行动,(3)稳定的偏好,即假定偏好不随时间变化,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和阶层间异差不大。将极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的偏好等假设结合起来运用,是其人口经济学方法的核心。贝克尔和舒尔茨(Schultz T.)主要运用劳动—闲暇选择和消费者需求理论即孩子的效用极大化原则来分析家庭的生育决策,以影子价格为工具分析孩子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他们的基本结论是认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同家庭收入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而对孩子的质量需求则与家庭收入的变动方向相一致。

莱宾斯坦(Leibenstein H.)的理论分析放宽了上面的三个假设,(1)行为是选择合理化,而非极大化,(2)市场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相当重要的,(3)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偏好不同,他们从各自不同的偏好结构出发来看待自己总的开支结构。莱宾斯坦主要通过讨论边际孩子效用的边际合理模型,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分析孩子的成本效用以及生育决策。他强调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降低的决定性作用,认为随经济发展和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孩子的效用(主要是非消费效用)逐渐降低而父母为抚育孩子所支出的成本却越来越高,其结果是导致父母生育意愿的下降和生育行为的转变。

人口经济学将个人视为自由的,其行为是富于理性的,是根据

他自己对周围事物环境变化的认识所作出的判断。新家庭经济学并认为生育决策是在家庭这一层次上作出的。在传统社会里，经济不发达，子女从很小就成为家庭的劳动力，创造家庭收入。生儿育女是作为对父母老年保障的一种投资，是对家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的一种保障。社会现代化直接改变了传统社会里子女所能提供给父母的这些利益和保障，或者为家庭提供了比子女更有吸引力的替代物。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家庭生产，大大降低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效用；教育的普及进一步降低了未成年子女成为家庭劳动力的可能性。传统社会里家庭的各种功能逐渐让给位各种专门化和非家庭社会组织结构、制度形式来实现。货币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抚育子女的成本，并且这些成本能被父母日益明显地感觉到。新家庭经济学将重点放在母亲的时间价值的改变和生育机会成本的提高上，并得出结论认为妇女的社会地位及经济依附状况是在经济现代化和生育率下降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干预因素。

伊斯特林(R. A. Easterlin)则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考虑相结合，从70年代末开始提出了“供给+需求+节育成本”的生育率决定经济学模型。

与传统人口经济学将孩子视为耐用消费品的分析相一致，在此个人决策模型中，孩子的需求最主要的是由收入、价格和偏好所决定的，孩子的供给则取决于自然生育率和儿童存活水平。伊斯特林认为，当潜在的孩子的供给超过父母对孩子的需求时，生育控制的动机就产生了。当节育动机超过节育代价（包括主观和客观的成本）时，生育控制得以实现，实际的生育水平是由节育动机与节育成本通过生育率中间变量的作用决定的。这里节育动机是这样定义的：在生育控制无需代价情况下，夫妇想要的存活子女数(C_d)与在没有生育控制情况下可能的存活子女数(C_u)之差，即动机 $= C_d - C_u$ 。

伊认为,社会现代化进程通过需求、供给和节育成本这三个变量作用于生育率。他特别选择了医疗卫生保健、正规教育、城市化、新商品引进及计划生育的实行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各种能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被首先归并为三大类:夫妇的生育历史,其他社会、经济、人口学和生物学特征及夫妇所属的社会集团、社会层次和文化。这三大类因素又通过影响对孩子的需求、孩子的供应和节育成本的途径作用于最终的生育水平。从历史发展来看,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婚龄逐渐推迟,哺乳期缩短,婴幼儿死亡率下降,自然生育率水平提高,又由于孩子经济效用降低等原因使生育意愿下降并造成孩子的供应超出需求,于是出现了控制生育的要求。与此同时计划生育的开展和新思想的传播与流行大大降低了生育控制的成本。最后当节育成本降到足够低、节育动机变得足够强大时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夫妇开始节制生育的转折点。此后,初婚年龄进一步提高。节育成本进一步下降,对孩子的需求由于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而稳定下降,实际生育水平降到一非常低的水平。

以上有关生育的经济分析都是在夫妇或家庭层次上进行的,他们在个人偏好、感知到的代价与限制因素之间进行权衡,并假定决策是理性的,夫妇的行为和选择被认为对生育行为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社区或社会的生育水平仅是众多夫妇生育行为的总和。

上述理论对我国人口学者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常成为从微观层次上研究群众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出发点。并由此得出两方面结论。

一是子女的经济价值。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者们认为,农民抚育生养子女的经济成本与预测收益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多孩生育直接的经济诱因。目前广大农村经济水平不高,农村生产力较落后,农业生产仍以手工劳动为主。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以来,农民家庭的生产功能得到强化,在集体经济不发达的乡村,大部分家庭